

1975年年底,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。他脸色黝黑,头发稀疏,由于双颊深凹,使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。他便是陈望道,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,上海复旦大学校长,又是资深的革命家;他是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最早的译者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者陈望道脱党前后



其实早在1920年,陈望道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。正因这样,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,周恩来当着他的面,对代表们说:“陈望道先生,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!”周恩来的这句话,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高望重的形象。

精心翻译

1920年,戴季陶在日本时,曾买到一本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《星期评论》上连载《共产党宣言》,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。得知此事,《民国日报》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:杭州的陈望

道。于是,戴季陶提供了《共产党宣言》日译本,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(原著为德文本),供陈望道对照翻译。

1920年4月下旬,陈望道译毕《共产党宣言》,准备寄往上海,正好收到《星期评论》编辑部发来的电报,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。

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前往上海。陈望道一到上海,便住进了李汉俊家。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,而且精通日、英、德语。陈望道当即把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文连同日文、英文版交给李汉俊,请他校阅。8月,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,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,即陈独秀、李达、李汉俊、沈玄庐、杨明斋、俞秀松、施存统和他。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。

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,印行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当务之急。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,在上海辣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成裕里12号,租了一间房子,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,在这里初版印了1000册。

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“有三本书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,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”。其中的一本便是《共产党宣言》,陈望道译,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”。

“二陈”反目

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,使“二陈”反目,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。事情的经过,如邓明以的《陈望道》一文中所叙述的:“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‘一大’之时,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,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。据李达回忆说:‘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,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。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,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。’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。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,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。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,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,信以为真,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,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,把李汉俊、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。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,认为‘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’。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,并向他公开道歉。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……”

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,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。

中共“一大”之后,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。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,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,而且要求脱党。

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(茅盾)劝

说陈望道无效,但陈望道明确表示“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”。这样,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“三大”之后,退出了中国共产党。

特别党员

1952年11月,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,从1952年至1977年,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。

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,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。特别是1956年元旦,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,回溯往事,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。

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,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。

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。他说:“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,就什么时候回来。不必写自传,不必讨论。可以不公开身份。”就这样,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,成为中共特别党员。

入党之后,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。直至1973年8月,他作为中共“十大”代表出席会议,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,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。

(据《人民文摘》)

王明扣“汉奸”帽子堵死陈独秀归党之路



1933年,陈独秀被国民党最高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。1937年,陈独秀被提前释放。

延安提出“回归”三条件

陈独秀出狱后,面对国家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峻形势,思想发生重大转变,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“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”,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。陈独秀两次主动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、博古,表示“赞成抗日

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”。

当时,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:1.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,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,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。2.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3.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。

但是,陈独秀在得知三条件后,十分不满,说:“我不知过从何来,奚有悔!”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,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,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,甚至回到党内,没有可能。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“城市中心论”的观念,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,讥笑毛泽东思想是“山上马克思主义”。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,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。

王明诬陷陈独秀是“汉奸”

陈独秀是个倔强的脾气,一时不写检讨,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最佳时间。正在这个关键时期,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延安。王明

到延安后第5天,就在《解放》杂志发表文章,称“日寇侦探机关……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——陈独秀——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,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”。接着,康生发表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》一文,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“事实”。王明和康生的态度,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。

王明到延安后,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,以势压人。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,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。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,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工作,一石二鸟,实质是在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,矛头直指毛泽东,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。

王明他们给陈独秀戴上“汉奸”的帽子,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。陈独秀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,发表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。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彻底决裂。

陈独秀拒绝周恩来劝说

1938年11月,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,因为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,王明

失势。这成为毛泽东重新谈陈独秀的转折点。1939年1月,中共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劝往延安,让其亲身感受延安军民的革命氛围,从而帮助转变其革命思想。陈独秀所在的四川江津属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,因此,说服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善做思想工作的周恩来身上。从情感上,王明、康生编造的“汉奸事件”严重伤害了陈独秀。虽然两人已经被调回莫斯科,但不能排除重返延安的可能。陈独秀没有选择延安,令周恩来十分失望。

周恩来并未放弃对陈独秀的努力,1940年,他又托陈的好友朱蕴山前往江津劝说,请他到延安去养老。但是,陈独秀说,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,大钊死了,延安死了,他也“落后”了;“他们开会,我怎么办呢?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。”他淡然拒绝了延安的最后一次邀请。

1937年出狱后,陈独秀未再参与任何政治组织。1942年5月27日,陈独秀在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、《陈独秀的最后十年》)